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卞孝萱 周群 主编
胡发贵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71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 组编

孔子儒學

胡发贵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卞孝萱 周群 主编

B222.05
H461-2

5223.0

H4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孟儒学/胡发贵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305 - 06366 - 4

I. 孔… II. 胡… III. ①孔丘(前 551~前 479)—哲学思想—研究 ②孟轲(前 390~前 305)—哲学思想—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139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书 名 孔孟儒学

著 者 胡发贵

责任编辑 景 新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87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366 - 4

定 价 1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一 孔孟儒学产生的时代	1
(一) 大变革的时代	1
(二) 战火绵延	5
(三) 社会矛盾加剧	8
(四) 礼崩乐坏	10
(五) 文化下移和文化繁荣	14
(六) 观念变革	20
二 孔子和孟子的生平	29
(一) “长人”孔子	29
(二) “好辩”的孟子	36
三 儒与儒家	41
(一) 儒家溯源	41
(二) “儒”之寻踪	43
(三) “儒分为八”	47
(四) 走向“显学”	49
(五) “独尊儒术”	52

四 孔孟儒学的出现	57
(一) 孔、孟分说的历史	57
(二) 孔贵孟轻的史实	59
(三) “亚圣”的浮现	61
(四) 孔孟儒学的出现	63
(五) 为什么会连称“孔孟”	64
五 孔孟仁学	72
(一) “仁者爱人”	72
(二) “仁也者，人也”	80
六 孔孟诚信思想	89
(一) 孔子“无信不立”的诚信观	89
(二) 孟子“朋友有信”的诚信主张	104
(三) 孔孟诚信思想的几个问题	118
七 孔孟民生思想	132
(一) 孔子“百姓足”的富民主张	132
(二) 孟子“制民恒产”的民生关怀	141
(三) 孔孟民生思想的历史意义	156
八 孔孟的财富观	159
(一) 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伦理	159
(二) 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的财富思想	172

九 孔孟的朋友伦理思想	180
(一) “朋友”概念的历史久远	180
(二) 孔子“友以辅仁”的交友观	182
(三) 孟子“朋友责善”的交友主张	187
(四) 孔孟朋友伦理思想的历史影响	193
十 孔孟的境遇伦理思想	198
(一) “匏瓜”与“恒产”	198
(二) 环境与道德	201
(三) 儒家境遇伦理思想的历史余响	204
十一 孔孟的忧患思想	209
(一) 孔子“忧道”	210
(二) 孟子焦虑于“杀人盈野”	218
十二 孔孟的批判精神	231
(一) 孔子的“不可忍”	231
(二) 孟子的“好辩”	240
十三 孔孟哲学的有为精神	247
(一) 孔子的“人能弘道”论	247
(二) 孟子的“强恕而行”说	255

一

孔孟儒学产生的时代

知人论世，要认识一位思想家、一个学派，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在历史分期上是春秋末期人；孟子生于公元前 372 年，卒于公元前 289 年，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孔子和孟子生活的时代，统称作春秋战国，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这是一个风云激荡、新旧冲突至为激烈的时期。

(一) 大变革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革故鼎新的变革，而其最为深厚的内在原因则是铁质农具和牛耕技术出现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古代冶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 513 年晋国为铸刑鼎，就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据史料记载，铁质农具在春秋初期已出现。《国语·齐语》曾载有管子这样的说法：美金（青铜）铸武器，恶金（铁）铸农具。到战国时期，用作农具的

铁器，使用得更广泛了。《孟子》一书中就有记载，当时有一位主张君民并耕的学者叫许行，影响很大，孟子弟子陈相也欲前往问学。孟子主张分工，他反问陈相，许行用釜做饭，“以铁耕乎”？可见至战国中期，铁质农具已广泛使用。

先民开垦田地，种植庄稼，主要依凭的是人力。在较为先进的中原地区，出现了脚踏耕具，即“耒耜”。据古代文献记载，先人很早就驯服、使用牛了，《易·系辞下》说，远在黄帝、尧、舜时代，就“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了。但这儿并未明说牛被用来耕地。考古发现表明，春秋后期逐渐出现了以牛拉犁的牛耕。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出土的春秋时期晋国的牛尊铜像，牛的鼻子已穿有环，说明此时牛已被用来从事劳作。传世文献也有印证。如据《论语》，孔子弟子中有一位叫冉伯牛的，即名耕；另一位叫司马耕的，字牛。晋国还有力士名牛耕的，耕牛相连，说明当时牛耕已为寻常之事。战国还出现了两牛共耕的犁，《管子·乘马》篇说：“距国门之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

铁器和牛耕的结合，使耕作技术大为进步，效率也大为提高，当时已流行“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的耕作法。所谓“易”，即快速的意思，有时也称疾耨，如“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管子·度地》）。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加之灌溉和施肥技术的改进，使农业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据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相国李悝的说法，当时魏国一亩田一般可产粟一石半，上熟时可产六石，中熟时可产四石，下熟时可产三石。当时一夫耕作，最多可养九人，至少也可养五人，“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技术和工具的进步，进而促进了田制的改革。古时人口稀少，荒地很多。不过随着铁农具的出现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如中原地区的宋国和郑国之间本有许多“隙地”，但到春秋后期被陆续开垦，建立了六个邑。

迄至春秋，各国的土地制度主要是井田制，土地属天子所有。但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井田以外被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它不属于公田而成为开垦者自己的“私田”。公元前645年，晋国就开始“作爰田”，即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这类私田在其他诸侯国也纷纷出现，并逐渐得到官府的承认，于是封建土地制度取代了奴隶制时代的井田制。这其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税赋的改革，即从劳役租向地租过渡，按土地面积大小和土地等级的好坏来收租。

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实行按亩征税的制度。齐国在桓公时，已废除公田制。公元前548年，楚国按土田定军赋。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秦国在战国初期“初为赋”。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各国都先后采用了按亩征税的新的税制，这也标志着各国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由于承认土地私有，私田也成为可买卖之物，“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地租的出现固然是一大历史进步，但农民的负担却也因此而增加。过去农民要不耕种公田，要不从军役，不会两者兼具；现在实行按土地收税，统治者“把战争与赋税力役分为两事，农夫却要一人同时负担两事。所以孔

子反对鲁国用田赋，说是‘贪冒无厌’，比强盗还坏”^①。不过，地税的出现，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还是深远的，“赋税制变化，标志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农村里从而出现了不同于领主的地主以及有土地与少地或无地的农民阶级。这种巨大的变化，因铁制农业工具的使用而愈益加速”^②。

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因为制度只是社会利益以及其分配的反映和凝聚，“私田”以及地租的出现，使过去的社会管理制度已难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因此改变这一制度、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制度，亦即“变法”是必然的。事实上，春秋时即已有变法了。如郑国就一改历史成例，郑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公之于众。晋国范宣子也同样铸刑书，公示国家法律于国中。

到战国时期，各国为发展生产，在兼并战争中赢得更多的优势，纷纷变法图强，一时间蔚然成风。如赵国有公仲连改革，韩国有申不害的变法，齐国有邹忌的变法。变法各国中，要数魏国最早，李悝是其代表人物。他制定的《法经》，重点在打击盗窃，保护私有财产。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废除封君世袭制，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秦国商鞅变法最为著名。公元前356年，他建立连坐制度，强令有二子以上的家庭分家，鼓励立军功，禁私斗。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开始进行第二次变法，统一秦国的度量衡，又将秦全境设为四十一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5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5页。

县,下令废井田,允许土地买卖。秦国经此两次变法后,迅速走向富强,为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各国在变法中,先后建立起君主集权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官僚制度,以官吏的俸禄制代替了过去的采邑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形成了常备兵外的征兵制。这些新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不仅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逐渐成为舞台的主角。

(二) 战火绵延

春秋战国时代另一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的战争。这一时期各国为称雄争霸,为辟地增财,纷纷尔虞我诈,恃强凌弱,攻城略地。仅据鲁史《春秋》记载的 242 年里,列国之间的战事多达 483 次,朝聘盟会 450 次。春秋时还主要是几个大国之间的争霸,即晋、楚、齐、越之间的“四分天下”。公元前 546 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此后一段时间兼并不再在诸侯之间进行,而主要变成了士大夫之间的你争我夺。春秋时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经过几百年间无数的兼并战争,到战国初年,只剩下十几个了,而大国只有七个,这就是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秦、楚。

战国时,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兼并战争更趋激烈和残酷了。战国时期社会经济进步很快,以城市为例,春秋时城的规模很小,一般诸侯国的都城周长不过 900 丈,通常邑的规模最大不过千室,普通的只有百室。到战国,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如韩康子就曾被迫送“万家之邑”给智伯。城里的经

济也非常繁荣,著名的如齐国的临淄,城中有七万户人家,有吹竽、鼓瑟、弹琴等各种演出,有斗鸡、走狗、六博等各种娱乐,城里车水马龙,人们挥汗成雨,举袂成幕,热闹非凡。战国的“名都”有不少,如燕国的蓟、赵国的邯郸、韩国的荥阳等,都是富冠一时的名城。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口激增,这就为扩军提供了人口条件。春秋初期,各大国的兵力较少,数万人而已。如晋国虽号称有六军,但在城濮大战中,只用 700 乘兵力,每乘以 30 人计,也不过 20 000 余人。齐国在齐桓公时,有 800 乘兵力,30 000 余人。到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兵力就猛增了。如鲁昭公时就有甲车 4 000 乘,有近 15 万兵力。到战国时,更有“万乘之国”了,兵力多达 30 万至 100 万之巨了。兵力增多,当然也与战国时的征兵制度有关。春秋时,士兵主要由贵族、贵族的从属与国人组成,后来实行郡县征兵制度,众多的农民在战时也成为士兵,这就大大扩充了兵源。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武器的问世提供了物质基础。春秋时武器是铜制的,主要武器有戈、矛、戟、弓、矢等。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后来铁制兵器渐渐取代铜质武器,春秋战国之际就开始了这种转变。在武器形制上,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许多新武器,如弩,它能“杀人百步之外”,非常厉害;另外,公输般还发明了攻城的云梯和舟战的钩拒等。

兵更多,武器更先进,于是春秋战国期间的战争也就更趋残酷。其表征之一是这一时期各国都奖励杀敌,不要俘虏,即所谓“上首功”。秦国当时就被称为“上首功之国”,齐国也规定斩得一首级可得一定的赏金。孔子说“春秋无义战”,战国

时的战争更是杀人如麻、惨无人道，史书于此记述甚详。其较为典型的例子有：秦献公二十一年和魏国战于石门，斩魏国士兵首级 60 000。秦惠文王后元七年，秦打败赵、韩联军，斩首 82 000。秦昭王十四年，秦败韩、魏联军，斩首 24 万。秦昭王四十七年，秦军在长平坑杀赵军俘虏 45 万。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统计，仅秦国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共斩首级 160 多万。

其表征之二是战争规模扩大。春秋时，用兵少。如晋国在前述的城濮大战中，只用 700 乘兵力。一般说来，春秋战国之际的战争，用兵数量多的也只有 10 万左右。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交战双方动用兵力往往多达数十万之众。如公元前 260 的长平之战，秦国就俘虏了赵军 40 多万。公元前 251 年，燕攻赵，用兵多至 60 万。

其表征之三是战争时间趋长。春秋时大战如城濮之战，也只一天就见胜负；鄢陵大战也只花了两天时间；吴国攻入楚国都城郢，也只不过十天。战国时期，战争时间拉长，一个战役打上几个月，甚至几年，已是常事。史称战国七雄“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魏惠王围邯郸三年而未能攻下，赵武灵王用 20 万大军攻中山，五年才凯旋。

其表征之四是更为讲究战术。春秋时的战争主要是马车作战，春秋战国之际则演变为步兵和骑兵的合成战术；同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如春秋时的孙武，战国的孙膑、吴起和尉缭等。

在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固然是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统一的不得不然的选择，但社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指出，一次战争，“十年之田而不偿也”；人

民更是饱受战争痛苦,以至“剖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战国策·秦策四》),更有甚者,“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战争所引发的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惨状,对当时的思想家,尤其是孔子和孟子触动很大,促使他们思考社会的前途和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上,孔子和孟子都反战,特别是孟子,他痛楚地控诉战争“杀人盈野,杀人盈城”,因此他痛恨所有“善战”的将军和谋士,认为他们应该获“上刑”,即应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也可能正是有感于生命的横遭摧残,所以孔、孟特别宣扬“爱人”的仁学。

(三) 社会矛盾加剧

春秋战国时期,另一明显的社会特征是社会矛盾的复杂与激烈。其表现之一是社会剧烈的分化。在社会剧烈的变革中,等级和身份产生了急剧的漂移,过去的王侯沦为贫民,过去的贫民升为贵族,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是屡见不鲜的世相。就前者,孔子曾这样感叹过:“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孔子自己也亲见,在晋国当过权的栾、荀、原等贵族,均沦为奴隶;而奴隶反升为名门,如齐之鲍文子、鲁之婴齐、晋之州绰等。由于当时等级、身份变迁升降的层出不穷,时人渐习以为常,鲁昭公的遭遇就很典型。鲁昭公被季氏赶出,死在国外。晋赵简子问史墨鲁国人民为何不愤怒。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

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其表现之二是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或闲或劳的不同的阶层。统治阶级内部有的悠哉度日，有的终日操劳；有的不事劳作，有的终年劳累。对此情形，《诗经》有生动的描写：“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慘慘劬劳；或栖迟偃仰，或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风仪，或靡事不为”（《小雅·北山》）。这种人群的劳逸分化，致使人际关系恶化，用墨子的说法是“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意即人对人像狼一样狠毒。

其表现之三是社会贫富悬殊。史称鲁国大夫季孙氏，比周公旦还要富。齐侯有马四千匹，积累财物任其朽坏。“民参其力”，“二入于公”，公室“公聚朽蠹”，而人民“三老冻馁”。晋侯也是大筑宫室，淫侈无度。一边是统治者过着奢侈的生活，穿戴的是金玉：“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墨子·辞过》），吃的是山珍海味：“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墨子·辞过》）；而人民却辛劳饥寒、痛苦不堪，《诗经》中“民亦劳止”，“民靡有黎，具祸以烬”等诗句，就深切表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人民还饱受统治者的剥削和欺压，“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诗·大雅·瞻卬》）。因此人民发出了“昊天不平”（《诗·小雅·节南山》）的怨恨，发出了“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职竞由人”（《诗·小雅·十月之交》）的谴责。

其表现之四是统治者实行残暴的统治。如陈国执政者庆氏监督“役人”筑城，一次夹墙板意外掉下，庆氏竟大开杀戒，

滥杀无辜。齐国的情形更坏，国人被处刖刑的很多，以至都城内的市面上，草鞋价跌而假肢疯涨，出现了“国之诸市，屦贱踊贵”的悲惨景象。

其表现之五是不断出现奴隶反抗。社会如此的不公平，统治者又如此残暴，必然会使人民滋生不满，甚至会迫使人民奋起反抗，此正如墨子所揭示：“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墨子·辞过》）。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盗憎主人，民恶其上”的现象就不断发生。早在公元前842年，奴隶就参与了推翻周厉王的斗争。春秋时奴隶的反抗更多：公元前550年，陈国筑城人民暴动。公元前520年，周王室里的“百工”出逃。公元前478年，卫国奴隶进攻卫庄公。公元前470年，卫国奴隶起义，赶走卫侯辄。春秋战国之际，秦国又有“盗跖”起义，参加的奴隶多达九千多人。他们“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影响很大，也深受人民欢迎。史称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不苟篇》）。当时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主要采取四种形式：一是逃亡，二是暴动，三是“民溃”，四是“为寇盗”^①。

奴隶反抗的频繁和斗争形式的多样，正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四）礼崩乐坏

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分封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

^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周天子授予土地给诸侯国，他有权向被授予者征收贡赋，而接收土地者则有义务向授予者进贡。周公就曾这样告诫周成王：你要用心观察众诸侯的纳贡情况，对纳贡和不纳贡的要心里有数。如果纳贡时不礼貌，就是侮慢王朝，与不纳贡等罪。假使诸侯不朝贡天子，庶也不朝贡诸侯，天下就乱了。周王朝鼎盛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享有无上权威。但到了春秋时，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不仅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各诸侯国也不怎么敬畏周天子了，而是各自为政。周天子的号令与规章制度，亦即“周礼”，日渐成为虚文，日益被忙于争霸的诸侯们所忽视，甚至是逾越，于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

礼崩乐坏的一个迹象是周天子要依靠诸侯王来生存。本来普天之下都是周天子所有的，但随着周朝的衰弱，天下为家，各诸侯国割据一方，周天子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到后来，周厉王的暴政，又迫使人民造反，使周朝的元气大伤，公元前 827 年，周宣王继位。史称他是中兴之君，“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不过后来被姜氏之戎打败，其子幽王继位。周幽王继位第二年，就发生了镐京大地震。天灾加人祸，导致周幽王被申侯率领的西部夷人杀死于骊山，西周灭亡。这一年是公元前 771 年。

太子宜臼在晋、郑、卫、秦等诸侯的拥护下，迁都洛邑，是为东周。周平王东迁洛邑，只有地方约 600 里，因赏赐、被诸侯侵夺以及被戎占据等原因，周天子自己剩下的土地和人民，就没有多少了。当时的政治情形是诸侯比天子强大，天子要